

人民币须成国际货币本位币

章玉贵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至少尚缺一至两张重要“门票”: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在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本位币的情况下,中国在这场全球金融危机面前只能看着美国通过印钞票转嫁经济危机。甚至,中国还面临西方主要大国集体做空中国经济的危险。改变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被动地位,必须适时将人民币打造成国际货币本位币。

毫无疑问,肇始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这场金融危机已经演变成全面经济危机。遗憾的是,在被世人公认为应对这场危机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竟然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愿意站出来主动承担责任。一向对华比较友好的保尔森对中国的指责根本经不起任何推敲,国人也不必太在意政客们的一时一言;好战的布什政府通过唆使以色列发动巴以战争,而这看来也不大可能转移世人对该危机的注意力。至于以改革为竞选纲领的奥巴马政府,世界也不应寄予太大希望。因为作为美国国家利益的代表,奥巴马政府和历届美国政府不会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奥巴马肯定会想办法拯救美国经济,但绝不会率先充当世界经济的救世主。

中国对危机冲击估计不足

显然,由于国际经济信息不对称,中国在去年对该危机的冲击力估计不足。

出于控制通胀的考虑,政府从去年初开始对经济下了太多猛药,结果在成功消解通胀压力的同时也窒息了一部分经济活力;中国也没有充分估计到次贷危机自去年9月份以来竟然会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经济产生那样大的杀伤力。欧美金融界十年来取得的成就就被毁伤大半,实体经济也跟随虚拟经济步入寒冷的冬天。中国本来被一部分经济学家视作全球萧条中的一个例外,但是冰冷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根本不是天外来客,无法隔离于这场金融风暴的冲击。

更为麻烦的是,作为风暴中心的美国,受伤的主要是金融业,实体经济除了以汽车为代表的制造业受伤较重以外,其他产业整体状况良好,而中国正好相反,较为保守的金融业未受太大冲击,但是实体经济却伤痕累累。而且从经济恢复的角度来看,金融业的恢复节奏显然要比实体经济来得快。如今,中国从国家领导到地方官员以及广大百姓都在为如何复苏经济而殚精竭虑。但是,经济复苏的钥匙似乎并不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只要美国经济持续低迷,各国政府哪怕使出吃奶的力气,最多也只能换来个经济小阳春。

没有国际货币本位币之痛

为什么中国要为这场危机买单?除了应检视自身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之外,关键在于中国目前仍缺一张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门票”:人民币再次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在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本位币的情况下,中国只能看着美国通过印钞票转嫁经济危机。

经济发展史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如果没有国际货币本位币,即使经济规模再大也只能是依附型经济。而处于货币中心地位的国家却掌握着定期对外辐射经济风险、转嫁经济发展成本的主动权。尽管从经济规模来看,中国已是世界经济强国之一,但既有框架使得中国处理巨额外汇储备的行为空间极小。中国当然希望利用这些外储在国际贵金属和其他战略资源市场扫货,但是没有卖家愿意提供这样的机会;中国也希望购买发达国家的优质资产,但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都不会轻易对此开闸。于是中国只能一再增持美国国债。而购买美国国债实际上是把中国经济绑在美国的战车上。美国可能不会轻易赖账,但要使美元贬值却并不困难。美国轰轰烈烈的救市行为背后,其实就是何时选择印刷美元。而且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美国享有国际货币本位币特权之后的巨大好处。已有专家算过一笔账,截至2008年,美元国际货币本位币的地位使美国获得的铸币税收入超过18.4万亿美元。此数字是美国2007年GDP总额的1.31倍。而中国就为其贡献了十分之一。

甚至,必要的时候,美国可以伙同欧洲和日本对人民币采取集体隔离的措施,集体做空中国经济。“门票”:人民币再次成为国际货币本位币。在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本位币的情况下,中国也可以加印人民币,但可能的结果除了制造国内通胀以及刺激出口之外,大概没有更多好处了。而且在欧美市场普遍不振的前提下,人民币即使强行贬值恐怕也未必能够刺激出口,反而可能遭致主要贸易伙伴的指责。这就是缺乏国际货币本位币地位的人民币不得不面临的尴尬。

应蓄势改变被动地位

因此,要改变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被动地位,必须适时将人民币打造成国际货币本位币,以保卫中国人民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而从当前的情势来看,未来一段时期或许是将人民币打造成国际货币本位币的时间窗口。

谁都知道,美国极不情愿人民币成为与美元平起平坐的主要势力,但是目前的美国正处于力量使用过度、实力相对衰落、国际信誉最差的时候,如果因为中国提升国际货币影响力而从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对中国施压,显然不是最佳时机。况且中国整体实力早已今非昔比,美国从战略上还是忌惮中国的。一旦美国从经济与金融危机中恢复元气,中国要从美国那里分享货币势力范围,难度显然要比现在大得多。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

焦点评论

巴菲特看好比亚迪的启示

李允峰

近日,香港文汇报报道,在美国底特律举行的车展期间,比亚迪总裁会见了巴菲特,这是巴菲特入股比亚迪之后,双方的首次正式会晤。巴菲特表示,估计未来会有大批像比亚迪一样的中国技术型企业崛起,中国未来会是国际资本的一个首选投资目的地。巴菲特看好以比亚迪为代表的中国技术型企业,或许会给我们带来不少启示。

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技术型企业,将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自主创新的技术型企业,是我们实现经济转型、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关键,这一点我们都清楚,但我们多数人对此却显得信心不足,甚至没有巴菲特的信心足。中国政府自2008年底以来一直强调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不过,国人对各行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是抱怀疑不信任的态度。而一直不投资技术型新兴产业的巴菲特不但开始投资新能源产业,而且还以不小的手笔落注中国人并不自信的自主创新领域。即便是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仍处于概念阶段,他就表示看好“中国技术型企业”,这给A股市场的启示应该不

仅在于新能源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上,核心应在于中国的自主创新上,以及对于自主创新,我们的企业、技术人员和民众,应该更多一些信心。

中国在各行业技术上确实落后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而正是这样,更显得中国自主创新的必要性和难能可贵,在中国政府不断强调加大力度支持自主创新的政策背景下,也更应引起证券市场的足够重视。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生物医药、信息技术及其他产业,拥有自主创新能力,而且有广泛潜在市场需求,资本市场如果在新股发行、再融资等方面给予其支持,将促进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更好地发挥,而这些公司所带来的效益,又会反过来促进证券市场的价值提升。

作为技术型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要舍得投入、敢冒风险,不仅要把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基本价值观,更要有“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和把自主创新当成一以贯之的思想。

实话实说

维持股市稳定重在聚拢人气

王勇

维持股市稳定已成为日前召开的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的重要议题。前期股市较大幅度的震荡格局,难以让投资者大胆进场,不少投资者空仓较大,再加上受外围市场走低影响,投资者坚持做多信心不足,这些都影响着当前股市的人气。面对宏观经济放缓的现实,市场各方必须继续努力,聚拢人气。

目前,仍然存在诸多不利因素。首先,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由于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相当多上市公司的业绩不容乐观,这对一季度股市的走势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其次,外贸进出口仍不乐观。此外,大小非解禁压力仍存。根据天相投顾的最新统计,今年,沪深两市将有6893亿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解禁规模比去年增加了近4倍,其中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石化、上

港集团和中国联通五家公司合计解禁数量即高达4881.79亿股,占比超过70%。上述这些,对股市人气会形成一定的打压。

但根据日前央行率先发布的去年12月份的货币信贷数据情况看,我国货币供应和信贷已出现全面回暖;与此同时,尽管出口呈现连续第二个月下降,但在出口退税率部分提高以及宽松的货币信贷环境下,进出口增速明显趋缓。由此可见,保增长相关的政策措施已开始显现成效。其次,财政部、央行、国资委、证监会和证监会等五部委都紧急出台了一系列维持市场稳定的措施,为我国股市提供了更高的安全边际;再次,钢铁、汽车、造船、电子信息等十大产业的振兴计划已经或正在陆续出台,而这些产业政策的新动向将不断为市场带来新的投资机会。上述这些因素又有利于股市人气



宋学海/图

的恢复。

当前,能够稳住股市的重要因素就是信心,应当对我国经济发展、股市繁荣抱有坚定的信心。股市将再次受益于国家战略。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风险,中央政府启动了以“加大投资、增加内需、尽量维持出口”为导向的保增长战略,用大规模财政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同时着眼长远,把扩大内需与行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这些都将成为股市再次带来巨大机遇。

要考虑股市的稳定,这个基调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措施出台。

当然,恢复信心还要有更现实的举措。首先可以考虑从税收上给予进一步的优惠,如取消红利税。其次是引导长期资金投入,如加快发行制度改革,坚持市场化导向,强化各主体责任,完善价格形成和股票承销机制;加大社保基金入市力度,鼓励更多的企业年金长线投资。另外,需要适时推出创业板、融资融券等业务。还可建立大小非减持专项基金,从而对制约当前股市走势的大小非进行合理有序疏导。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高级培训师,经济学博士。)

财经杂谈

经济时评

合并国税地税的几个难点

黄梹梓

中国是税收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的税收征收成本占税收收入总额的0.58%,日本为1.13%,而中国近年来已接近8%。自从1993年国、地税分设以来,“抢税”的斗争一直在继续,纳税人的纳税成本也无形增加,对此,专家呼吁合并国税地税。

准确地说,我国推行分税制、分设国地两套税务是在1994年。推行分税制和税务机构改革,有效增加和保障了中央财政收入,加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使中央财政有了雄厚的资金投资重大项目建设、应对各种突发的自然灾害、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平衡区域经济的发展,统筹改善国计民生,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在推行分税制中将税务机关“一分为二”,也的确增加了税务机关的征收成本和纳税人的办税成本。近些年来,从税收学界到广大纳税人,再到每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委员的提案议案中,呼吁合并国税地税,减少税收成本的声音一直未曾间断。

从国、地两套税务机构分设征收的情况来看,关税、消费税、从中央企业征收的所得税都成为中央财政收入,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地方企业所得税这些中央与地方共享税,都划归国税部门征收;由地税部门征收的税种中,除营业税以外都是一些征管难度较大的零散税收,而

今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增值税全面转型,又将使原本属于地方税收的主体税种营业税中的交通运输、金融保险、邮电通讯、房地产等“收入大头”并入增值税范围,地方税收就更是趋于“萎缩”。在这种情形下,地税机构的职能进一步弱化,也就给国税地税合并带来了契机。

从推行分税制以来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占我国财政收入总量的比重来看,更是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推行分税制之前的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足30%,1994年分税制改革至今,地方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逐年走低。专家指出,目前中央政府取得全国税收收入的60%,地方占40%;而中央财政支出占30%,地方财政支出则占70%。这导致了地方财力和事权严重不匹配。

然而,两套税务机构分设容易合并难。机构分设之后,两套税务机构的人员都有所增加,各级税务机关的领导职数更是增加一倍。税务机构“合二为一”,固然能够从根本上降低征收征管成本、减轻纳税人的负担,避免“抢税”矛盾,但税务机关将要面临的是减员裁员,还有领导干部的重新配置安排问题也很棘手,在当前就业形势堪忧的情况下,也必将增加就业压力,带来不稳定因素,这也许才正是国税地税合并的真正难点所在。

要对税收成本进行考核

肖华

近年来,我国的财政税收都以两位数字的幅度高速增长,但当我们这些财政税收大量用在征收成本上时,恐怕再多的税收,也失去了意义。

我国的税收征收成本为什么这么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税收征收成本考虑过少,我国建国50多年来,税务部门基本上没有对税收征收成本核算,全国总成本、分税种成本都没有一个准确数字可供考核。而在很多时候,对税收的考核就是看征收了多少税。一个地方不管征收成本是多少,只要税收高,政绩就大。正因为如此,许多地方为了税收而税收,而不顾成本。如为了强化征收,加大了征收力量,可是这征收力量都靠增加人员取得。最明显的就是,目前我国有100万税务干部,而美国只有10万人。我国大量边远地区一两个人的税务所不敷出,工资比收的税还多。

在许多政策法规上,也是很少考虑征收的成本。有的税收政策改动频繁,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浪费。有的地方对税法的解释随意性较大,有的甚至超越税法条例而作行政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法的严肃性和规范性,人为地造成了税法的多变性,从而增加了征收的复杂性和难度。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就提出了“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即一切赋税的征收需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是国家所收入的。目前我国税收征收成本占税收收入总额的8%,是一些国家的10多倍,明显过高。

为了提高征收效率,降低畸高的征收成本,实现征收成本最优化,必须对征收成本进行考核。通过考核,迫使税务机关和部门在重视税收的时候,也要重视征收成本的降低,从而在机构和人员设置上坚持“精简、高效”的原则,能合并的就合并,减少征收入员,减少征收成本。有了成本的意识,我们在征收政策法规制定上,在税种的设置上,除了考虑税收的调节和监督职能外,也会考虑征收成本的高低,尽量选择税源比较集中、征收难度较小的税种,以降低征收成本。在政策上尽量保持连续性,减少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浪费。

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应该抓住这一契机,在减税的时候,把征收成本考虑在内,征收成本越小,国家的收入才会越多,我们在保增长上的投入才会有保障。对征收成本进行考核,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在当前更有建立的必要。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

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邮件至pp1118@126.com;或寄信到深圳彩田路5015号证券时报评论版(518026)。